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 (CND) 主办 • — • — •

—— 增刊 第五七四期 ——
(二〇〇七年五月二十一日出版)

本期目录 (zk0705d)

【研究动态】《文化大革命：历史真相和集体记忆》前言	宋永毅
【书刊评论】《文化大革命：历史真相和集体记忆》序	林培瑞
【自由论坛】周泉缨的新书和他的“文革试错”论	卜伟华
【各抒己见】坚决反对“试错”论	王年一
【学术争鸣】“文革浩劫论”不容否定	
——读周泉缨的《文化大革命是历史的试错》	阎长贵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museums.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投寄 tougao@cnd.org。请在 subject 中标明 CR 字样。

【研究动态】

《文化大革命：历史真相和集体记忆》前言

• 宋永毅 •

今年（2006年）是中国文化大革命（1966—1976）发动的四十周年。

由美国21世纪中国基金会、纽约市立大学及纽约皇后区图书馆合办的“历史真相和集体记忆：文化大革命40周年国际研讨会”，于2006年5月12日至14日在纽约举行。60多名海内外文革研究学者济济一堂，探讨文革历史真相、爆发原因、它在中国人心中的集体记忆及其深远影响。这次研讨会得到了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纽约市立大学、台湾民主基金会和纽约皇后区图书馆的资助和国际知名的数十家中英文媒体的广泛而持续报导。如同美国之音、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和北美最大的华文报纸的《世界日报》和《星岛日报》所一致赞誉的：这是自文革结束以来最大、最成功的一次文革国际研讨会。

在文革爆发三十周年之际（1996年），美国21世纪中国基金会和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合作，也开过一个国际研讨会，并出版了五十余万字的会议论文集《红色革命和黑色

造反》(杨建利主编,美国21世纪中国基金会出版,1998年)。那次会议和那本论文集都为晚近的文革研究的深入和发展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而呈现给读者的这本一百万字、题名为的《文化大革命:历史真相和集体记忆》的论文集,则是十年前会议的延续和这次新的国际研讨会的成果结晶。当然,为了更全面地反映近十年来的文革研究的新发展和新成果,本书也收集了一些会议外的海内外学者的论文。就“新发展和新成果”而言,我以为这次会议独特的象征意义和这些论文的深度广度;它们表现出来的挑战性、建设性和当代性;它们对于重构对文革的集体记忆的战略性的呼吁;尤其是海内外华人学者对肩负的历史使命的深入理解,都不仅会对文革作为一种历史研究产生极大的影响,还必然对中华民族汲取历史教训,推动中国大陆的政治改革发生影响。

◇ 独特的象征意义和罕见的深度广度

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由中共和它的领导人毛泽东亲自发动的一场史无前例的反文化、反人道的人间惨剧。这场浩劫不仅残酷地清洗了被毛认为是他的党内对手的刘少奇等一大批中共的高级干部,更在所谓的阶级斗争、“继续革命”和“破四旧”等等的名义下,杀戮了数以百万计的无辜的民众,毁坏了遍及全国的文明古迹,使中国的经济陷入濒临崩溃的泥沼,使一个文明古国的教育、文化、道德都毁于一旦。它不仅在中国数千年历史上是一场浩劫,在整个人类历史上,也无疑是一场只有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由法西斯纳粹党徒发动的对犹太民族的“大屠杀”才可以比拟的人道灾难。

或许也正是因为这场历时十年的大灾难的肇事者是中国共产党和它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为此,中共当局在文革结束后的三十年内,一直在大陆禁止独立的文革研究。设法使中国民众遗忘文革,忘却历史的创痛。今年,中共有关部门非但在中国大陆严禁对文革的任何纪念和研究活动,还千方百计阻止海外的文革纪念活动。这次国际研讨会本来邀请了近二十名中国大陆的学者与会,但是中共的有关部门以“海外敌对势力介入”的荒唐理由阻拦了多名著名学者与会,但是,仍然有多名中国大陆学者冲破封锁,勇敢地与会。不能与会的大陆学者也大都递交了他们的书面发言。中共有关部门的倒行逆施甚至引起了海外中间势力的极大反感。香港亲中的大报《明报》5月14日就在头版头条以<北京禁纪念文革爆发40周年:劝阻学者赴国际研讨会>为题,指责中共当局的做法“不利于全民反思文革”。

捷克的著名作家米兰·昆德拉曾经说过:“民主与专制的斗争,在某种意义上便是记忆和遗忘的斗争”——中共有关部门禁止文革研究,掩盖历史真相的目的正是为了延续它的专制统治。中共有关部门煞费苦心的拦阻和会议的成功召开反而使这次研讨会有了独特的意义:它是中华民族不泯良知的一次体现;它象征着海内外知识份子对学术自由的有力坚持;它还是国际民主力量对专制势力的一次成功打击。

就这次国际研讨会的规模而言,也是自文革结束以来最大的一次。会议邀请了来自美国、加拿大、澳洲、欧洲、中国大陆、台湾及澳门的60多名文革研究学者提交了51篇论文和安排了62次中英文演讲。台湾方面也有中研院院士,近代史研究所所长陈永发教授与会,说明会议确实学术精英云集。会议5月13日和14日在纽约皇后区图书馆演讲大厅举行的公开演讲,吸引了近400名听众。美国国家公共广播电台(NATIONAL PUBLIC RADIO)、美国之音(VOICE OF AMERICA)、自由亚洲电台(RADIO FREE ASIA)、英国国家广播电台(BBC)、法国国际广播电台(RADIO FRANCE INTERNATIONAL);北美最大的华文报纸《世界日报》、《星岛日报》、《明报》和《多维时报》等;北美最大的新闻网站《多维网》、《大纪元》和《博讯网》等几十家网站都发表了追踪报导。其中北美最老牌的《世界日报》竟一连发表了10篇头条新闻和长篇报导文章。不少会议的报导已经出现在中国大陆的网站上。目前,美国之音、BBC和

香港的《信报》、《动向》等报刊还在发表对会议的长篇评述文章。一次国际研讨会在国际媒体中引发如此长久持续的报导，也确实是少见的。

就会议讨论的课题而言，也显示出了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文革和世界”、“文革中的少数民族，宗教等问题”、“文革研究中引起争议的一些问题——造反派、林彪问题等等”、“文革研究的史料学”、“被扭曲了的文革记忆”等等，都是文革研究中从未或很少涉猎的领域。

◇ 文革研究的新阶段：挑战性、建设性和当代性

这一国际研讨会和他所发表的论文的成功绝不仅仅在于国际媒体的报导和宣传，而是在于它们所肩负着多重使命和对“文革研究”作为一门学科的独特贡献。英国国家广播电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在报导这次会议时指出：它代表了海内外研究的一个新阶段——这不是一个言过其实的赞词。

在我看来，会议的主要成功还是在于它的挑战性、建设性和当代性。

其一，“挑战性”是指会议揭露了许多被中共当局长期掩盖的历史真相，驳斥了中共官方的文革理论，从历史研究的角度动摇中共当局的合法性。例如，长期以来，文革的最大受害者之一的刘少奇和邓小平以及协助华国锋粉碎“四人帮”的叶剑英都被认为是文革的单纯受害者和抵制者。但是会议的论文有力地揭示了：文革后中共官方有意地夸大了他们和毛的分歧，掩盖了他们其实也是文革积极的拥护者和参与者的真相。美国明州诺曼第学院教授丁抒在他的论文〈叶剑英在文革初期〉以翔实的例证说明：叶剑英在文革初期积极参与了整倒罗瑞卿、推崇对毛的个人迷信、建立“首都工作组”镇压成千上万的无辜群众和迫害不同派系的军队干部等等的活动。因此，叶决不是一个“反文革派”，而是一个地道的“文革派”。加州州立大学洛杉矶分校宋永毅的论文〈刘少奇对文化大革命的独特贡献：你不知道的故事〉则从刘少奇在六十年代的“四清运动”中的极左理论和实践，刘少奇在文革初期对成千上百万干部和群众的无情迫害等历史真相中揭露：刘邓周彭（真）等中共“卓越的领导人”，都为文革作出他们各自的贡献。颇具讽刺的是，其中要数文革最大的殉难者之一刘少奇的贡献最大。事实上，文革的发生和发展，绝不仅仅是毛泽东一个人的事，也不仅仅是他的追随者林彪、江青等人所为，刘少奇等在文革中被打倒和清洗的中共高层重要领导人都是有份的，他们曾是文革的积极推动者和拥护者。因而，文革是中共的一次集体犯罪。

对于文革和中共上层斗争的关系，值得注意的还有澳洲莫纳希大学教授孙万国的演讲和论文〈文革尾声天安门事件再探——毛泽东晚年的中国精英政治危机应对〉。孙万国教授在他的论文通过翔实的考证和细致的分析揭示：“很难说天安门危机是出于‘四人帮’明确的反周战略所造成的结果。虽说“四人帮”急于批邓，把悼念周恩来的活动视为转移斗争大方向的阴谋，这当然是促成危机的一个因素。但更重要的是，毛泽东本人对已故总理的不满和他对追悼活动的压制，决定了天安门事件的大气候。”他的论文还进一步认为：“通过天安门危机事件和研究，乃至从林彪事件之后整个高层政治的动态来看，“四人帮”这个概念或提法，显然难以成立。王、张、江、姚四人，原本只是中共体制中的边缘人物，但由于毛泽东出人意料的提拔，先后攀上了权力的高峰，进入了政治局。四人之间，在核心的共同利益与激进的意识形态方面，诚然有其相通之处。然而，有关他们之间的相互憎恶、从未间断的猜疑，和各种鸡毛蒜皮的摩擦，也存在着大量的证据。甚至在毛泽东西归的当月，他们失去了共同的守护神之后，还能见到这类现象。论者都说四人合谋串通，意图夺权抢班。但其实他们根本没有进行，也没有弄出一套协同合作、周密无间的政治行动方案。”

对文革中的一些重大历史事件，会议也有完全不同于中共官方结论的真相揭露。如大陆徐

海亮教授的论文〈武汉“7·20事件”——至今争论不休的史实和观点〉，就揭示了1967年7月发生在武汉的保守派群众组织“百万雄师”和武汉军区独立师冲击毛泽东住所的“武汉事件”其实是毛泽东、周恩来处理不当而引发的一场“兵变”。而毛事后为了稳定军队抛出了中央文革的“王（力）、关（锋）、戚（本禹）”作为替罪羊。

其二，“建设性”是指会议提供了多重的研究文革和当代中国历史的崭新角度，从而把海内外的文革和当代中国研究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对于少数民族地区的文革研究，一直处于空白状态。著名西藏女作家唯色的书面论文〈西藏“文革”疑案之一：1969年尼木、边坝事件〉和澳门大学教授程惕洁的论文〈四十余年回首，再看内蒙文革〉都对西藏、内蒙地区的文革有全新的描述。例如，程惕洁教授在他的论文中比较了民间、中共官方和半官方的内蒙学界关于文革中血腥的“内人党事件”的受害者的人数：1）逮捕关押了80万人，多达50万人致残，5万人被拷打迫害致死；2）34万6千多人受到关押迫害，1万2千2百22人被迫害致死。另有8万7千180多人致残；3）2万7千900余人被迫害致死，有12万多人被迫害致残，被关押者的总数，相信应该在50万人以上。程惕洁认为：第三种数字比较符合历史事实。但当时整个内蒙的“蒙族人口总数才两百多万，即使这个中间数字，已经占到蒙族人数的百分之二十多，迫害比例之高，在全国是罕见的”。

再如，把文革放在20世纪60年代的世界左翼思潮和整个国际共运史的大背景下考察，是这次会议的又一个特色。威斯康星大学教授郭建的〈文革、世界六十年代及西方文化理论〉，特拉华州立大学教授程映红的〈文革：向世界输出革命〉等从各个不同的角度讨论了文革发生的成因及其机制以及文革对世界和当今中国的影响。美国《当代中国研究》主编程晓农在他的题为〈中苏文革比较〉一文提出了一个发人深省的论点，他认为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并非毛泽东在中国的首创，而恰恰相反，是毛泽东从苏联类似运动中吸取灵感模仿而来。此一论点引起了会议的热烈讨论，尽管不少意见认为，文革从持续时间，运动的规模，群众动员之广泛等方面来看，并非苏联1928到1931年的“文化革命”运动可比，但此论点引出了“文革”是否共产极权制度下必然发生的重大理论问题的讨论。

还值得一提的有加州大学尔湾分校社会学教授苏杨对文革中农村大屠杀的数学模型的研究（见本书中〈文革中的大屠杀：对湖北、广东和广西三省的研究〉一文）。他和他的斯坦福大学导师魏昂德（ANDREW WALDER）一起运用官方县志中的死亡人数研究文革，比较湖北、广西、广东三省文革中的大屠杀，以地方志所记载的屠杀数位翔实地证明中国文革曾严重侵入农村，颠覆了认为文革仅仅发生在城市的一般成见，同时也雄辩地表明阶级斗争的意识形态和官方各级政府的操纵乃是暴力发生的主要原因。

最后，这次国际研讨会有着它鲜明的当代性。文化大革命毫无疑问改变了中国大陆整个的政治经济面貌。从经济层面上来说，如果没有文革后濒临崩溃的经济，邓小平等人也不会搞改革开放。从政治结构上来看，现在的中共领导人已几乎全是文革中的“红卫兵一代”，文化大革命在他们身上都打下了不可磨灭的政治烙印。然而，对于文化大革命对于当前中国社会在政治文化上的影响，对于胡锦涛等人的文革经历对于他们执政思想方针的影响，无论在西方还是中国学界，都还没有过系统扎实的研究。这次会议中宾州萨斯奎汉娜大学历史系系主任魏楚雄教授的论文〈文化大革命及其对中共第四代领导人的影响〉做了可贵的尝试。他认为：毛时代刚结束后的权力斗争也造成了第三、四代领导人的快速崛起，而“太子党”在文革中和文革后的丑恶表现“为提升胡锦涛和温家宝这样没有特殊家庭背景的官员铺平了道路。”他的论文重点分析了文革对胡锦涛的影响，认为：胡在文革中是清华大学的“四一四”派，“这一事实表明，到了文革期间，胡锦涛的政治思想和风格已基本形成：他是追随刘少奇和邓小平路线的典型的技术官僚……他任期内的“改革”政策恐怕就是努力恢复到共产党的十七年路线、把刘少奇邓小平的施政纲领发挥到它的极致效应而已，绝不会超越这个限度。”从而，他从一个侧面批判了中

共当前的领导层向文革和文革前倒退的种种理论政策。

◇ 海内外学者共同重构对文革的集体记忆

因为中国官方的蓄意阻挠和误导，长期以来历史真相被掩盖，中华民族对于这场灾难的集体记忆当然出现了很多问题。例如，文革已经结束了三十年了，但是中国大陆的“毛泽东热”一直经久不衰，而不少年轻人已经全然没有了文革记忆，甚至连“文革”发生在哪一年都不清楚……所有这些“失忆现象”都绝对是有害于整个民族吸取文革教训和推动大陆的政治改革的。

这次会议还集中表现了海内外学者共同重构对文革的集体记忆的努力和把反思文革作为中华民族的重大历史任务的呼吁。关于中国国内的所谓“毛泽东热”，本书中的两篇论文就有精辟的分析。美国《北京之春》主编胡平先生的论文〈文革后三十年的大陆毛泽东热分析〉就着重分析了“毛热的兴起，看上去是民间‘自发’的，其实却是被官方诱发的”的过程。北京学者陈小雅的论文〈毛泽东的“品牌化”、神化及其退化——“毛泽东热”透视〉则从历史的长河中涉足，指出：“（一）延安时期的毛热，具有严重的“人谋”色彩，其目的是打出中共的“品牌”人物；（二）建国初期的毛热，可以分为民间和中共高层两个层次，民间的毛热基本上属于文化层面的活动；在高层，却存在明显的“赎买”动机；（三）文革的毛热，是毛泽东由“品牌人”走向“神”的过程，究其内在发动原因来说，既有毛泽东及其同党的阴谋元素，也有党群矛盾及社会压抑的借题发挥；（四）最近这波发自民间的毛热，表达的是位于社会下层的人民大众对于现实的喜怒哀乐”。对于大陆目前仍然存在的毛泽东幽灵不散的现象，她认为：“我们需要进行的工作仍将是艰苦而漫长的，战线是广大而层次是复杂的。因为它有赖于我们——每个从毛泽东时代过来或受其影响的人的彻底“去毛化”——从理念到思想，从思维定势到行为方式，从语言到手段的彻底“脱毛”过程”。

有关文革记忆，加州圣玛丽亚大学教授徐贲的论文〈全球传媒时代的文革记忆：解读三种文革记忆〉是一篇高屋建瓴，鞭辟入里的理论探索之作。他成功地运用了西方有关集体记忆的理论，把目前的文革记忆分为“虚拟博物馆的文革记忆”，“说故事的文革记忆”和“消遣娱乐和商业化的文革怀旧记忆”三种。直面流行的商业化的文革记忆，他不无担忧地指出：“从政治、社会和人性的灾难性去认识文革，只有在自由社会的公共政治空间中才有可能。人们需要有开放的讨论、研究、不受权力限制的历史教育、博物馆、公共论坛和各种反思、纪念形式。唯有如此，自由的文革讨论才能有制度的保证条件。在自由公共空间中被展现的军用皮带将不再是文物市场上的有价商品或者历史清白的纪念品，而是一件残害过活生生受难者的凶器。那些品类繁多的“毛头象”也不是什么制作精美的工艺品，而是千千万万副套在人们身上的思想枷锁。”他的另外一篇论文〈怀旧物品和文革记忆〉也指出：“物品对于记录历史有重要的作用，但历史并不全然记录在物品之上……文革的真正意义并不记录在那个由革命图记所描绘的光明和谐图景之中，在这个光明和谐的表面之下，深藏着苦难、残暴、恐惧和压迫。不涉及这个层次，关于文革的公共意识定然不会完整。”

在会议的举行过程中，大陆社科院教授徐友渔传真来了大陆学者不久前举行的一个地下文革讨论会的简报，并由那次讨论会的参加者之一的徐海亮教授宣读。这是一个不被官方认可的“地下”研讨会，但反映了民心所在——大陆人民不会忘记文革。那次会议的最后一个单元讨论得最热烈的问题是口述史与文革研究的关系。与会者认为首先要注意的是抢救历史资料的迫切性，40年过去了，当年10岁的中学生，现在已经50多岁；当时的中年人，现在已经80、90岁，再不抢救，历史就要被带进棺材。北京青年政治学院教授邢晓群在她给纽约研讨会的论文〈口述史与文革研究〉中提出：“今年是中国‘文化大革命’发生40周年。由于官方以行政权力设阻——文革档案不开放，文革出版物受限制，有关文革的学术研究在中国大陆步履维艰。出于历史的使命感，民间的独立学者对于文革，仍然坚持抢救性的学术研究。采用口

述历史的方法，就成为目前条件下，推动文革研究继续深入的一条可行之路。”

在这一方面，大陆学者朱建国的论文“大陆文革博物馆萌芽的现状与发展趋势”也有其独到的见解。针对一些学者积极呼吁官方设立文革博物馆的努力，朱建国认为，正如官方目前广泛举办的反腐败展览一样，文革悲剧的重演将不会因为官办博物馆而避免。他因此大力提倡民办博物馆，提倡民间独立深入地反省文革灾难及其后果。另外，他还对巴金的文化大革命博物馆模式提出了有道理的异议和批评。

对于文化大革命这样一个历时十年、生灵涂炭数以千百万的历史事件，即便是这本一百万字的著作也难以记载起历史真相于百分之一、千分之一乃至万分之一。更何况这里面还有因中国大陆执政者的种种阻挠而导致的一个民族的集体记忆的淡化和丧失。然而，这个国际研讨会和这本论文集却代表了一种正直的良知和坚韧民心，即决不再允许历史的悲剧重演。为此，我们必须揭示出文革的历史真相，必须要健全我们民族的集体记忆。

~~~~~

### 【书刊评论】

#### 《文化大革命：历史真相和集体记忆》序

• 林培瑞 •

本书副题是“历史真相和集体记忆”。这两个概念都很重要，各有各的价值，但关键处在那个小小的“和”字。“历史真相”和“集体记忆”恐怕得同时追求才行。一个国家或民族要是达到了集体意识，但记忆的内容是神话，不但常常无济于事，甚至对当代和后代都可能危险。反之，要是记忆的内容是真实的，但只有个别的人私下能考虑和谈论，也根本不可能起到社会所需要的教导和痊愈作用。

2005年4月12日中国总理温家宝在印度新德里答记者问说：“只有尊重历史的国家，只有对历史负责任的国家，只有能赢得亚洲和世界的人民的信任的国家，才有资格在国际社会上担任更重要的责任。”温评论的是日本进不进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问题，但无意中说出了一个有广泛意义的基本道理。

近代历史上的例子不少。比如，后纳粹的德国应该算是反省得相当的彻底：道歉，赔偿，建博物馆，立纪念碑都有。在南非，“种族隔离法”以后的南非政府设立了“真相与和解委员会”，效果虽不能算十全十美，但是也算很可观。俄国和东欧的作家——帕斯捷尔纳克（Pasternak），米沃什（Milosz），索尔仁尼琴（Solzhenitsyn），哈维尔（Havel），等等——都已经有力地探索了斯大林时期的噩梦过程和噩梦后果。日本虽有一部分顽固人士拒绝承认战期的罪恶，但毕竟政府宰相口头上道过几次歉，国家宪法上也拒绝了核武器。（日本教科书也并不像中国政府所说的那样千篇一律掩盖日本的罪恶。课本的说法不一，但总的来说比掩盖大跃进，掩盖文革的中共课本客观。）美国奴隶制的黑暗历史时段一百多年以后，经过教育（包括教科书），电影，博物馆，和政府的具体措施，虽然不能说伤口全好了，但“真相”和“集体意识”的问题还是达到了一些成果。

二十世纪的中国如何呢？毛时代中国的“非自然死亡率”比希特勒的德国和斯大林的苏联都多，最极端手段的残忍度不比日本人1937年在南京的差，对传统文化的摧毁不亚于波尔布特在柬埔寨的成绩。但中国的“集体意识”怎么样呢？“真相”能露出多少呢？

从大原大本的层面上看，我不认为中国人忽略了毛时代的分水岭性质。随便翻看二十世纪上半叶的文学作品，从梁启超到鲁迅，茅盾，老舍，巴金，一直到延安时期的赵树理等，十篇当中总有九篇是“向前看”的作品。中国当前的的问题虽然多，但我们可以挣扎，可以探索，应该进步。未来还是在前面！相比之下，总的来说，毛死以后的文学作品基本上是“向后看”的。我们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怎么可能对彼此那么残忍？从“伤痕”和“寻根”自然如此，连后来的余华，韩少功，残雪等的“先锋怪诞”很难说跟毛时代的荒诞没有关系。可能是一种变形的表达法而已。并且，对“真相”感兴趣显然不限于作家和知识分子。与二十世纪初孙中山所比喻的“一盘散沙”的中国老百姓相比，今日的中国工人和农民对“权利”和“社会正义”的概念还是清楚得多，敏感得多了。

我不相信中国人不想回顾，或对历史真相不感兴趣。要是显得不认真回顾的话，问题的大部分与政治压力有关。1978年邓小平鼓励了民主墙和“伤痕文学”，但不到两年之后就开始逆转了，要求中国人“向前看”，要求同胞假装说整个儿毛时代的灾难是四个人惹的，而毛还是“七分好”的。邓有“理论”，江有“重要思想”，胡有“和谐社会”的提法，但毛一直是七分正确，人为地饿死至少两千万人一直还叫做“三年困难”，毛的尸体一直还躺在天安门广场上，不以为然者受到警察的注意。所谓“注意”从“善意的规劝”出发，再不行就能发展到思想工作，隔离审查，劳改治疗等等。

毛泽东闯的祸像一个大逆向磁铁扎沉在二十世纪中国历史的中流。不少人对它感兴趣，想研究它，解剖它，了解它的来龙去脉，免得同样的悲剧有重演的机会。但人们走到离这块大逆向磁铁一定的距离之后，不知怎的，每次都得转向其他方向：或是停止在‘四人帮’的层面上，或往‘七分好，三分坏’走去，或写成荒诞语言处理。死不肯逆转的人，人身就得逆转，被驱逐出境，流亡到海外。

无疑，中国人认真回顾文革，最大的障碍是共产党的干扰。但还有别的障碍。假如要是共产党一夜之间消失了，中国有了个自由民主的环境，也还会面临一个巨大的搜集材料和掌握材料的工作。中国的文革那么复杂多端，中国那么大，人口那么多，八亿人有过八亿人的经验，即使信息自由流通的话，也不容易掌握，不容易总结，不容易分析和理解。

除此之外，回顾自己过去的疼痛或自己的错误，不管是个人还是国家，总不是一建轻而易举的事情。这种痛苦的事情一般需要一段时间的沉淀。希特勒浩劫刚刚结束的时候，很多人不敢写集中营。似乎有一种较原始的心理反映：“我不忍写那么丑恶的事情”，甚至（虽然自己是受害者）“我感到羞耻，不肯揭露羞耻的事情。”过了二十年德国人和犹太人就写得更多一点了，但比较全面深刻地描写，即‘浩劫文学’的高潮，是等了五十年以后才出现的。中国写文革也自然面临这个问题。我记得九十年代中叶，郑义和北明刚刚从中国出来到普林斯顿定居，普大中国学社的朋友就郑义的“红色纪念碑”举行了一次研讨会。美国普大应该是一个较为没有共产党压力的环境，参加的人也都是敢独立思考的人。然而，就郑义书中的“吃人”片段还是有不少不同看法。没有人说吃人的细节是不真实的。问题不在此，而在于要不要发表这种事实？中国人能不能接受？外国人能不能理解？会不会有损于中国人在国际上的形象？参加讨论的人似乎都觉得这种心理难题是中国独特的问题，但事实上并不然。德国，日本，俄国，美国（以及柬埔寨，越南，卢旺达，亚美尼亚，等等许多国家）也面临过，或者正在面临，同样的心理障碍。

有时候，面对真相所需要的勇气还超过“敢不敢说”或“忍不忍写”的问题。有时候还得从新考虑自己的基本概念，对自己接受挑战。比如，二十五年前，很少人会提“造反派”的半句好话。没有人提所谓“毛的文革”和“人民文革”的区别。但水落石出，再过一些时间，有人从积极的角度分析了文革前饱受官方虐待而“趁机造反”的老百姓。这本书里头就有五篇好

文章从这个角度分析问题。

这本书里搜集的是一些有历史责任感，民族责任感和道德责任感的中国人回顾毛泽东文化大革命的文章。虽然文革已经过了四十年，但这些好文章还只能算一种开端，一种非常有价值的良好开端。

~~~~~

【自由论坛】

周泉纁的新书和他的“文革试错”论

• 卜伟华 •

2006年12月，香港银河出版社出版了周泉纁的新书：《文化大革命是历史的试错——对毛泽东主席公开点名评判我的回应》，全书40万字。

这本书涉及了我感兴趣的清华大学“文革”的情况，这部分内容占了全书的约四分之一。其中比较详细地描述了清华大学早期造反派内部的分歧，关于“四一四”成立的详细经过，以及清华园内“团派”与“四一四”的矛盾斗争，尤其是披露了他本人撰写《四一四思潮必胜》和《炮打陈伯达之一》、《炮打陈伯达之二》的动机、经过和之后的遭遇。书中有些观点相当深刻，一些议论也颇具文采。例如在谈到红卫兵运动失控的根本原因时，作者正确地指出“是指导文革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本身内含着自身不可克服的悖论”。又如在谈到关于毛泽东对待清华武斗的态度时，作者写道：

“毛泽东主席关于武斗的策略，与他的夫人江青提出的关于‘文攻武卫’的策略是一样的，这个策略是有阶级性的。正因为如此，江青对清华两派武斗的性质的判定更为露骨，江青在毛‘7·28讲话’中插话说：‘414也是专门反对中央文革，反对总理、伯达、康老的，但他们还是群众组织，蒯大富要打掉它。’因此毛决不是泛泛地反对武斗，而是坚决地肯定左派对右派的武斗，而反对右派对左派的武斗。例如，清华团派对414派的武斗，这种武斗，在毛看来在必要时就应该打，继续打下去，大打，打他十年八年也没有关系；如果团派在武斗中彻底胜利了，那么毛就顺理成章地支持团派建立以团派为基础的清华文革政权；如果团派打不胜414派，毛就对清华进行军管，直接按照毛的意志在清华建立文革政权；如果414派将团派消灭或打跑了，那么毛就派解放军去清华包围414派，至此倘若414派顽抗，那么解放军就坚决彻底地消灭414派。”（见周泉纁：《文化大革命是历史的试错——对毛泽东主席公开点名评判我的回应》P144，以下文中所注页码皆为该书页码）

周泉纁在书中提出的关于瑞典模式的“阶级等强度制衡”的和谐社会的一些观点，与其他不少有识之士〔1〕对瑞典模式的认识一样，也很值得我们认真思索和借鉴。

周泉纁的这本书和前不久出版的清华“四一四”派的第一把手沈如槐的书《清华大学文革纪事——一个红卫兵领袖的自述》〔2〕参照来看，对了解当年清华“文革”肯定大有好处。遗憾的是，他们的对立面——蒯大富没能写出自己的回忆录来，如果有的话，那才是相得益彰，令人叫绝呢。过去倒是有传闻说蒯大富也要写回忆录的，最近听说蒯大富在深圳患轻度中风，令人担心不知以后还能不能看到他写的关于清华“文革”的回忆录。

◇ 周泉纁其人

周泉纁原来是清华大学动力农机系学生，“文化大革命”中是清华井冈山兵团内与蒯大富的“团派”对立的“四一四”派的总部委员，是一个智囊人物。1967年8月发表《四一四思潮必胜》一文，曾在全国引起轩然大波。（3）1967年9月14日和9月17日，贴出《炮打陈伯达之一》和《炮打陈伯达之二》两张大字报，旋即被投入监狱关押整整一年后，作为“文革”犯错误的学生分配到河北省成安县农机厂当工人。1977年7月，因为在北京张贴《论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等大字报再次坐牢。两年半后被释放。（4）后来在胡耀邦之子胡德平的支持下，周泉纁得以入党、提干，先当农机厂的厂长，再当成安县经委副主任，1984年当了由武汉108所大专院校联合组建的“东湖公司”的常务副总经理。1987年后到中国汽车进出口公司深圳分公司工作。1989年9月因为“利用东湖公司副总经理职权挪用公款四万元五个月”案被撤职、开除党籍。（5）周泉纁在理论探索和反思文革上是非常执着的。由于被毛泽东称为“理论家”，他自己也认为自己确实是块搞理论研究的料。（6）几十年来，他不论在逆境下还是在顺境下，都痴情地执着地进行理论思索和探求关于文革的问题。1997年，他自称在佛祖“缘起说”思想启迪下，顿悟创生了“统一论哲学”和“阶级合作理论”。2005年发表专著《现代佛学（统一论哲学）》。今年4月中旬的清华“四一四”聚会上，我见到了周泉纁先生，并作了简短的交谈。他虽已身患癌症，但看上去精神尚好。在他给我的名片上，印有三个头衔：佛学家、哲学家、政治理论家。

◇ “文革试错论”

周泉纁认为，在他之前，“作为社会舆论的主导潮流，否定文革的理论观点不外乎两种”：即“文革错误论”和“文革浩劫论”。

“文革错误论”“实际上也是官方的观点。这种观点认为文革主要是领袖毛泽东主席个人失误引起的、被篡党夺权的野心家林彪、四人帮利用的历史性的严重错误。”

“文革浩劫论”“认为毛泽东主席发动文革的动机是合理的，文革失败主要原因是造反派红卫兵的素质低下、派性严重、不能团结大多数群众、从而坐不稳文革打下的江山的缘故。”“造反派恶魔”“搅得整个中国昏天黑地几乎难以收拾，最后毛泽东不得不动用铁的手腕将造反派这帮恶魔捏得粉碎，文革也就只好以彻底失败而收场。”

周泉纁很武断地下结论说，“文革错误论”“代表了试图‘打下天下，坐天下’的中国无产阶级的利益和政治倾向”；“文革浩劫论”“实际上代表了两极冷战期间国际资产阶级的利益和政治倾向；或者说代表了经济上被消灭的中国资产阶级的利益和政治倾向。”“文革试错论”是“现代知识阶级的世界观的组成部分”，“实际上代表了现代社会诸阶级相互制衡共同发展的利益和政治倾向，这种利益和政治倾向就是现代人类在现代知识阶级必然主政的知识阶级领导下构建和谐世界的利益和政治倾向”。（总论，P2—3）

在否定了“文革错误论”和“文革浩劫论”以后，周泉纁提出了“文革试错论”。他是这样表述的：

“文革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世界两极冷战之必然；文革是人类历史上民族与民族之间、阶级与阶级之间相互残杀和政权暴力更替恶性循环之必然；文革决不是类似二次大战那样，是人类社会不记取历史教训从而重复过去老错误的浩劫，而是类似古罗马斯巴克斯奴隶起义、古中国陈胜吴广农民暴动、近代英法资产阶级革命、现代的十月革命那样，是人类历史上史无前例的伟大试错；人类社会如果不进行类似文革的试错，人类就无法在漆黑的宇宙中摸索前进；因此，没有文革中国就不可能迅速地改革开放，没有文革世界就不可能迅速证伪传统马克思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并迅速走出两极冷战的误区；没有文革人类就不可能迅速认识西方典型的

瑞典模式社会的‘阶级等强度制衡’的和谐社会之本质，从而迅速开始构建共同发展的和谐世界；所以，中华民族为文革付出的代价是值得的和光荣的，文革为人类的未来而勇于试错的探索精神，将在人类文明历史中永葆青春！”（总论，P3）

“试错”一词，在概念上，是指科学界为了寻找正确理论，用实验的办法排除可能的理论错误的意思。周泉纁所谓“文化大革命是历史的试错”的意思，指“文革”是人类探索和寻找理想社会模式的必然的探索过程。

我认为，从广义上说，特别是在科学实验领域中，试错论是可以成立的，在一些经济领域中或在一些微观的社会学领域中可能也有一定的意义，但将他用之于宏观的社会科学领域中则可能导致极大的谬误。

周泉纁从“文革试错论”出发，就得出了一些极为荒谬的结论。下面试举几例：

将“文革”称为“共产主义革命的新娃娃”。他说：“没有第一次文化大革命，就没有我们这一代革命者，没有第一次文化大革命，就没有中国的现在，没有第一次文化大革命就没有共产主义的光辉未来！同志们、战友们！千万千万要注意，决不能在泼掉‘四人帮’理论这盆脏水的同时，把文化大革命这个共产主义革命的新娃娃泼出去呀！”（P4 2 5）

坚持毛泽东关于“走资派”的说法。“文革是上层建筑领域内的国际共运。文革的目标是解决共产党干部和平演变问题，即解决资本主义当权派问题。关于走资派的提法很多人都不以为然，甚至到今天连共产党自己对走资派的提法也不认账，我认为这完全是自欺欺人的事。铁的历史证明，如果讲走资派的提法，在文革中是一种天才的正确提法，那么今天则是普遍正确的提法，试问当今的中共当权派有多少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毛泽东发动炮打资产阶级司令部，对于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和真正的无产阶级而言是天经地义的。”（P4 7 3 — 4 7 4）

将毛泽东发动“文革”称为“不可磨灭的功勋”。“毛之所以伟大，不是因为他拥有过时的无产阶级世界观和错误的文革思想与文革路线，毛的伟大主要是他的为民族复兴的拼死奋斗精神和大无畏的探索实践，为我们民族，甚至也为人类的发展，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P2 7 5）“毛泽东思想，特别是毛泽东的文革思想，原则上是继承和发展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典范。”（P2 4 3）

说“文革”没有侵害世界上任何民族的利益”。“毛泽东发动的文革决不是希特勒发动的二次大战……事实上文革不但没有侵害世界上任何民族的利益，相反文革为人类提前结束世界两极局面作出重要贡献。所以，发动文革的毛泽东是民族的英雄、是世界的伟人。”（P4 9 4 — 4 9 5）

高度评价毛泽东晚年的极左思想。“毛泽东是我唯一崇拜的共产党领袖。我认为毛是共产党内对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真正吃透的为数不多的人，也是中国历史上不可多得的有自己理论理想的人。毛说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我认为这句话高度概括了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理论实质，也高度概括了文革的理论实质。”（P4 4 0 — 4 4 1）

认为“文革”是中华民族渴望崛起的必然。“历史证明，毛泽东主席的政治素质，包括他集中国法家帝王之大成之治国术在内，都是发动文革和展示文革实质的绝妙和高效的领袖载体，同样中国九亿民众万众一心响应毛的号召参加文革实践的历史事实，也说明现代的中国老百姓也是展示文革实质的绝妙和高效的载体的民众载体。而领袖和群众双方都是文革绝妙和高效的

载体的根本原因，是中国民众万众一心试图通过‘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让自己的共和国在世界历史上万年牢，所以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是中华民族万众一心渴望崛起的必然。”（总论，P25）

◇ 为毛泽东和文化大革命辩护

周泉纁为毛泽东犯的错误进行辩护的方法其实是挺拙劣的。他非常简单地用是否有先例来区别“英雄”和“罪人”。请看他是怎么说的：

“历史上的英雄人物与历史的罪人的人生，在社会价值上是有质的差别的，这种质的差别，表现在他们所犯错误的性质是完全不同的。历史上的英雄人物所犯的错误的先人没有试过的错误，而历史的罪人所犯的错误的先人早已经试过的错误。所以历史上的英雄人物是在历史的最前面拉着历史前进的人，而历史的罪人则是在历史的后面拖历史发展后腿的人。正因为如此，我在《文化大革命是历史的必然》之中判定，毛泽东领导中国大跃进、人民公社和文化大革命的实践，和毛泽东领导中国工农打江山一样，都是证明毛泽东是历史的英雄的历史证据，因为大跃进、人民公社和文化大革命，是人类历史上没有先例的试错，是现代人类证伪马克思主义之必然和必须，所以大跃进、人民公社和文化大革命，加速了中国社会的发展，并为中国迎来了改革开放的福音。”（P500）

周泉纁这种不论所犯什么错误，只看是否有先例的区别“英雄”与“罪人”方法真是太离奇了。但更为离谱的是周泉纁关于毛泽东发动文革的说法：“国际上资本主义世界坚持冷战的压力，共运内部中苏分歧的压力，国内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失败的压力，刘少奇为首的走资派越来越在党内外得人心的压力，中华民族急切赶英超美的压力，毛泽东个人决意成为马克思主义的伟大继承人的责任和压力等等因素，全部聚焦到发动文革这一点上。这一切说明毛泽东冒着‘砸得粉碎物质不灭’的决心发动文革进行他人生最后一搏，原则上确实是历史之必然。反过来讲，任何一个有强烈的历史责任感和坚定的理论信仰的知识分子，处在毛泽东当时的地位，都必然会孤注一掷发动文化大革命。”（P495—496）

于是，毛泽东发动“文革”就成了一种历史的必然和充分体现他强烈的历史责任感和理论信仰坚定的完全正当的行动了。

周泉纁认为，当今世界存在三大阶级，即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和知识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由于自身的局限性都不可能正确认识“文革”，而只有知识阶级才可能正确认识“文革”。周泉纁为“文革”辩护，因为他认为“文革”是“无产阶级和知识阶级联合起来，对资产阶级在原始积累时期所犯的严重错误的最后的报应”、“是人类社会非主政阶级的自救行为，是落后民族探索自强之路的伟大尝试”，“文革为人类提前结束世界两极冷战局面作出了重要贡献”。

周泉纁为“文革”辩护的一些基本概念，可以从下面的这段话反映出来：

“对被文革镇压的资产阶级而言，文革当然是大劫，毛泽东当然比希特勒还不如，所有这些看法对资产阶级而言是无可非议的。而对无产阶级而言，现在虽然也无法否定文革的失败，但他们出于本阶级的需要，当然要把文革说成是失误，而且总是企图将文革的责任推给毛泽东个人，以便为本阶级的信仰或主义开脱责任，这叫舍车保帅。最后，现代知识阶级一旦觉醒成为独立的阶级，就不再以上述两大阶级的看法为自己的看法，现代知识阶级对文革的看法要点如下：

第一，否定文革必须从否定国际共运的指导思想传统马克思主义出发，其他任何否定文革

的理论认识都不可能是正确彻底的。

第二，如果说文革是浩劫，那么它追根溯源是无产阶级和知识阶级联合起来，对资产阶级在原始积累时期所犯的严重错误的最后的报应；如果说文革只是毛泽东个人的错误所致，那么毛泽东之所以有权发动文革，拿无产阶级的还相当稳定的大好江山做马克思主义的试验品，是因为毛在打下无产阶级江山过程中起了某种决定性的作用。所以，资产阶级在文革面前必须认清过去企图超越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完全依靠暴力革命去改变自己的历史地位是不可能的。总之，文革是人类每个阶级自作自受的必然的产物，无论是无产阶级还是资产阶级都无须在文革问题上怨天尤人。

第三，文革最明确地告诉人类，任何阶级企图通过消灭、剥夺或改造其它阶级来改变自己的历史地位是行不通的，其结果只能适得其反。人类社会的三大阶级——无产阶级、资产阶级和现代知识阶级唯一真实的出路，是坚决停止任何损人利己甚至相互残杀的作为，全心全意团结在现代知识阶级的周围，顺应社会发展规律之大势，各守己责，相互合作，永远走共同发展之路。

第四，毛泽东发动的文革决不是希特勒发动的二次大战。文革追根溯源是无产阶级与知识阶级联合起来对资产阶级原始积累过程中残酷的剥削和压迫的最后的回报，是人类社会非统治阶级的自救行为，是落后民族探索自强之路的伟大尝试。而从人权的基本原则出发，文革即便理论上是错误的，但在情理上是‘造反有理’的。事实上文革不但没有侵害世界上任何民族的利益，相反文革为人类提前结束世界两极冷战局面作出了重要贡献。所以，发动文革的毛泽东是民族的英雄，是世界的伟人。”（P493—495）

◇ 与“三个代表”套近乎

本书内封前面有三句口号：

“高举划时代的“三个代表”思想的旗帜，
坚持中国特色的改革开放路线，
构建“阶级等强度制衡”的和谐社会！”

非常奇怪和滑稽的是，这本宣称已经成功证伪了传统马克思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书，却偏要和继续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共产党现今倡导的“三个代表”套近乎。从字面上看，“三个代表”和周泉缨所发现的“社会三位一体稳定发展规律”〔7〕似乎有某种相近的东西。在“三个代表”刚刚提出不久，周泉缨即认定：“江的‘三个代表’思想与我的‘统一论哲学’和‘阶级合作理论’原则上是完全一致的。这意味着中国共产党经过80年的艰苦奋斗，终于划时代地引领中华民族穿过了两极冷战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误区，进入‘三个代表’和构建和谐社会的空前伟大的时代。”（P205）

“从2001年7月1日起，我在网上无条件地拥护和支持江泽民主席提出的‘三个代表’思想，并在理论上向一切试图对抗‘三个代表’思想的势力进行坚决和有效的反击。”（P205）

周泉缨认为他的理论与江泽民、胡锦涛的理论有很多共同的地方，而且他的认识总是要比中共领导人的认识要领先一步。他说：“在中国官方发表划时代‘三个代表’思想之前，体现‘三个代表’思想内核的‘阶级合作理论’，已经完整地由我在1997年顿悟的‘统一论哲学’推演出来，并同时《广东佛教》上发表，后又于2001年7月1日，在江泽民主席关于‘三个代表’思想的重要讲话发表的同时在网上系统地发表。”“在中央发表关于‘构建和谐社会’

的重大提法发表前，我已经依据‘统一论哲学’和‘阶级合作理论’明确揭示，现代人类社会的理想模式是西方典型的‘瑞典模式’社会，这种社会的基本特征就是全社会诸阶级通过等强度的和谐制衡，去共同适应历史和国际大环境，从而谋求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发展。”（P214—215）

为了与“三个代表”套近乎，周泉纁还把现代政治与多数人极为陌生的佛学概念搅和在一起，其说法更可令人瞠目。

“从佛学角度看问题，毛泽东主席和邓小平总书记属于阿修罗神的范畴，而江泽民主席和胡锦涛主席则属于佛和菩萨的范畴，虽然他们归根到底都是为了普度众生，但是他们普度众生的逻辑和法则是质有质的差别的。从治国的方略看问题，毛和邓的治国方略属于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的范畴，纵然邓提出了改革开放的国策，也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改革开放国策，最终目标还是消灭资产阶级；而江和胡的治国方略则是现代理想社会的治国方略，本质上就是西方典型的瑞典模式社会的治国方略，即全社会诸阶级在知识阶级的领导下等强度制衡和共同发展的治国方略，具体到中国就是一句话：高举划时代的‘三个代表’思想的旗帜，坚持中国特色的改革开放路线，构建‘阶级等强度制衡’的和谐社会”。（P206）

看了周泉纁的这些高论，令人哭笑不得，我想送给他一句成语：风马牛不相及也！

◇ 作者走向了自己的反面

在1967年看到《四一四思潮必胜》文章时，我们不少人都佩服作者的思想敏锐和文笔犀利，认为他是一个能在混乱的环境中保持清醒头脑看问题的很有理性的人。四十年后看到其新书时，却觉得他是个快要走火入魔了的狂人，信口开河，出语狂妄，所发议论和断语往往大而无当，不着边际。其高谈阔论中往往夹杂着一些佛家的即宗教的词语和概念，令大多数人如堕五里云中，不知其所云。总的来说，过去那个才华横溢，意气风发的青年才俊早已无影无踪。

周泉纁在书中反复告诉读者，他是在佛祖“缘起说”思想的启迪下，通过“顿悟”创生了“当代最先进最正确的‘统一论哲学’和‘阶级合作理论’从而彻底证伪了传统马克思主义，破解了文革奥秘，并解决了有关的涉及人类命运和前途的重大理论问题”。（作者简介）极端自负的他，说起话来口无遮拦，根本不给自己留下丝毫的退路。例如在对毛泽东的评价上，他说：“我自从1997年顿悟‘统一论哲学’起，毛泽东的一生在我心中已经盖棺定论了，而且我评论毛泽东的观点，与世界上所有唯物和唯心地评论毛泽东的观点是不同的。当然人们可以赞同我评论毛泽东的观点，也可以反对我评论毛泽东的观点，但是当今世界任何人都无法在逻辑上证伪我评论毛泽东的观点，相反我评论毛泽东的观点及其内在的逻辑，能够证伪当今世界上任何与我评论毛泽东的观点相悖的观点。这就是我的‘统一论哲学’和世界观‘笑傲江湖’的时代特色。”（P498）

我想，作者这么聪明的人为什么要使用那些让人生厌的自卖自夸的极端词语，这不是自毁形象吗？或如古人云“语不惊人死不休”，他就是要用这些极端的词语来引起人们注意。但也只能是适得其反呀！经历了“文化大革命”中太多的极端化语言折磨的过来人，一看到类似的形容词就会条件反射式的大倒其胃口。

现在的作者早已不是当年写《四一四思潮必胜》时的作者了。文革后十年，作者说：“通过在中国社会农业县基层的摸爬滚打，使我真正体会到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必要性。实际生活和大量的社会考察使我几乎百分之百地认为，中国共产党作为无有效监督机制的一元化的执政党，其自发的倾向与历史上所有的农民起义领导集团的自发倾向一样，必然走向腐败。”“我

已经完全背叛自己在文革中坚持的较右的‘四一四派’的立场，倒向了极左的‘团派’一边。”（P5 3 4）“这种严酷的现实使我非常痛苦，我在成安的十多年中经常想，历史的发展趋势似乎在证明蒯大富对共产党的总估计是正确的，而我们‘四派’似乎估计得过分乐观。看来基层的实际情况证明，对共产党来说要不变质似乎只有一个办法，就是让老百姓不断造反，不断搞大翻个儿，即不断地改朝换代，否则共产党要不变是难上加难”。（P4 4 9）

虽然周泉纁已经走向了反面，但这并不影响过去的周泉纁和他当年撰写的《四一四思潮必胜》文章的历史地位。我仍然认为《四一四思潮必胜》是在当时对“文化大革命”认识上的一篇很有见地的文章，它集中反映了相当大的一批青年知识分子当时的思想状况，是今后研究“文化大革命”的一篇重要文章。

我不同意周泉纁的“文革试错论”，但支持他继续进行理论探索和对“文革”的反思，即使在探索和反思的过程中出现一些偏差，也可供世人讨论和借鉴。现在更大的问题在于对“文革”问题上的虚无主义倾向。这种虚无主义的表现是无视“文革”历史的存在，对惨痛历史教训采取回避或轻描淡写的态度，压制人们对“文革”历史的研究和反思，封锁人们了解“文革”历史的渠道。历史决议否定了“文革”，但不能一否了之，反思和总结“文革”历史教训的任务还摆在中华民族的面前，需要全民族认真对待。在虚无主义倾向的影响下，一些歪曲历史，赞扬“文革”的奇谈怪论频频出现，还有人借尸还魂，时不时把所谓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动机是好的那一套说词拿出来招摇过市，用以掩饰“文革”的罪恶和阻挡人们对“文革”的声讨和批判。唐朝杜牧有言：“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对“文革”的教训，也是这样。

2 0 0 7 年 4 月 2 2 日

注释：

〔1〕如原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谢韬最近发表的《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一文中说：“瑞典虽是小国，瑞典社会民主党虽是小党，但它是民主社会主义的典范，它的经验具有普世价值，是对人类文明的伟大贡献。在民主宪政框架内，瑞典社民党依靠自己政策的正确，代表了广大人民的利益，得以连选连任、长期执政的经验；在经济建设中把效率和公平统一起来，实现同向分化、共同富裕的经验；正确处理劳资关系，调动工人和企业家两个积极性，实现劳资双赢的经验；有效地防止特权阶层出现，杜绝官员以权谋私、贪污受贿，长期保持廉政的经验，为我们在改革开放中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走民主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成功的范例。”

〔2〕沈如槐：《清华大学文革纪事——一个红卫兵领袖的自述》，香港时代艺术出版社，2 0 0 4 年 4 月。

〔3〕毛泽东在 1 9 6 8 年 7 月 2 8 日召见北京红卫兵“五大领袖”时曾谈到周泉纁和他的《四一四思潮必胜》：“毛主席说：‘你们这五大将我们都是护你们的，包括蒯大富骂你们黑手的，我也是偏向你们这一边，你们回去一讲，我们有偏向，井冈山四一四兵团，就会对我有意见。我不怕别人打倒，清华四一四说四一四思潮必胜，我就不高兴。说打江山的人不能坐江山，无产阶级打天下不能坐天下，坐天下的就是四一四！四一四有个理论家叫周泉纁，理论家何必抓呢？人家是一派的理论家嘛？人家写文章你抓人家干什么！应该放出来，人家有意见让他再写嘛！不然不是没有言论自由了嘛？’温玉成立即起身打电话叫卫戍区放人。”（韩爱晶：毛泽东主席召见五个半小时谈话记）也有人将这篇《四一四思潮必胜》与《论新思潮——四三派宣言》、《大局已定，八一五必胜》、《今日哥达纲领》、《中国向何处去》等并称为“文革”中的“五大毒草”。

〔4〕1 9 7 9 年 1 2 月 2 4 日，北京市公安局作出《关于周泉纁的审查结论》（京公予复字第 5 2 4 号），全文如下：周泉纁，男，3 7 岁，浙江诸暨县人，商人出身，学生成分。捕前系河北省成安县磷肥厂技术员，住该县中学家属院宿舍。因来京贴大字报，1 9 7 7 年 7 月 8 日拘

留，1978年5月19日被逮捕。经审查：周泉纁1977年4月至7月四次来京串联，在清华大学、朝内大街人民出版社对面墙上贴大字报，反对《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的有关揭批“四人帮”的文章，干扰了揭批“四人帮”运动，在当时拘留审查是必要的。经审查：周虽然有错误，但尚属思想认识问题，按反革命罪逮捕是不妥的。现决定将周泉纁释放，回原单位安置工作，由北京市公安局补发关押期间工资壹千五百肆拾五元整。

（5）关于此案，周泉纁在书中为自己作了辩解，并认为此案是当时湖北省的领导人关广富等人“企图通过搞我的所谓问题，向胡德平发难，并最后将斗争的矛头指向胡耀邦”。（P174）

（6）周泉纁在书中说：由于毛泽东的关注，“使我第一次真正自信地认定，自己的哲学才能和自己的人生价值，应该说毛主席是世界上第一个真正发现我的价值的人。”（P509）

（7）周泉纁在书中对“三位一体稳定发展规律”的解释是：“从宇宙从大爆炸产生最简单的氢原子起，到今天复杂的人类社会系统为止，宇宙间所有的事物或系统，其内在结构和外在关系，都必然都自发地倾向于由三个要素形成三对连环式的矛盾组成的三位一体形态，因为现代应用科学证明，三位一体的形态相对而言能耗最低、效率最高、稳定性最强。（总论，P7）

~~~~~

## 【各抒己见】

### 坚决反对“试错”论

• 王年一 •

41年前，伟大领袖在中国大地上发动了文化大革命，一搞搞了10年，中国大地上充满了血泪。1976年，毛泽东谢世，文革结束。文革使中国伤痕累累，人民怨声载道，齐声诅咒。中国共产党在邓小平领导下，拨乱反正，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清除文革的错误。在邓小平的主持下，起草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经全国4000人讨论，由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历史决议》的主要精神是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明确指出，发动和领导文化大革命的毛泽东犯了“左”倾错误，其错误的严重程度超过了过去所说的“路线错误”。文化大革命败坏了社会主义的名声，遭到世人的唾弃。文化大革命已牢牢地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人们不会想到，在文革发动40年之后，2006年12月，香港银河出版社出版了周泉纁先生的著作《文化大革命是历史的试错》。此书高度评价文化大革命，美化文化大革命，为文化大革命大唱赞歌。我不太明了“试错”的含义，查《辞海》，不料《辞海》未收这个词，可见这个词相当生僻。（“试错”一词来源于英文 trial and error，指一种通过多次试验和失败来解决问题的方法，不同于通过认识事物本质和规律来解决问题的方法。——编者）周泉纁先生在《作者自序》中说：“文化大革命是历史的试错”的意思，指文革“是人类探索和寻找理想社会模式的必然的探索过程”。

周泉纁先生对“试错”论极其自负，他在《作者自序》中说：“我个人认为《试错》一书对文革评价是当代最科学最正确的。”“因为《试错》一书在理论上能够证伪目前国内外所有的有关文革的观点，而目前国内外所有的有关文革的观点则无法反过来证伪《试错》一书中有关文革的观点。”“本书涉及的理论体系事实上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新颖而庞大的世界观体系。”

毛泽东本人在文革中多次论文革，没有一次讲什么“试错”。

毛泽东本人的思想，以崇尚暴力为特征，他曾以“我们是革命战争万能论者”（《毛泽东选集》第2卷，1991年版，第547页）而自豪。由于他不了解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关系，

患有“恐资”的思想，在和平时期，他的思想以“反对资本主义”为特征。

谢韬先生在2007年第2期《炎黄春秋》上发表《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一文，说：“1895年3月6日，恩格斯在《〈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中对马克思主义的整个理论体系进行了最后的反思和修正。”在《导言》中，恩格斯期待的是通过工人阶级的合法斗争取得政权，保留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应该说，这是恩格斯对欧洲各国社会主义运动的最后遗言，是对《共产党宣言》以暴力革命夺取政权“旧策略”的重要修改。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恰恰相反，它以所谓“防修反修”、“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为号召，如此“试错”，岂非笑话？

在周泉缨先生的心目中，毛泽东是极其伟大的人，要为人探索新路了。这与实际相差很大，毛泽东1949年至1976年在中国执政28年，其成绩是很小的。（中国政府的宣传对成绩是极其夸大的。）单少杰先生的《毛泽东执政春秋》，著名史学家唐德刚的《新中国三十年》，何清涟女士主编的《二十世纪后半叶历史解密》，李锐老先生的《李锐谈毛泽东》，陈小雅女士的《中国“牛仔”》，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高华答《凤凰周刊》记者问《毛泽东是重大的历史现象》，这些知名人士都不约而同地一致批评了和抨击了毛泽东的执政。

毛泽东自称“马克思加秦始皇”（李锐在“马克思”后加注：“实为斯大林”）（引自中共中央党校教授陈登才主编的《毛泽东的领导艺术》）。军事科学出版社1989出版，第28页）毛对斯诺说过他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的话。

在毛执政期间，中国有大批人民非正常死亡。估计人数最高者为张戎，她在与其夫君合著的新著《毛泽东传》中估计是“7000万人”。多数史学家估计为3000万到4000万人。我们宁可少说一些，就算是3000万吧，一个国家在不足百年中非正常死亡3000万人，这是何等可怕！即使非正常死亡1人，也是社会主义国家的耻辱。这非正常死亡达3000万人的国家领导人毛泽东，还能“试错”吗？

毛泽东在执政方面走进了死胡同，一方面他拘守“一党专政”，实行专制主义，禁绝民主，另一方面在经济上拘守斯大林的“计划经济”。专制和计划经济，苏联搞了几十年，最后亡党亡国，中国“以俄为师”，也吃苦头，还有什么可以“试错”的。

对毛泽东的评价，民间流传12个字：“开国有功，建设有过，文革有罪”。听说这12个字出自中共元老级的人物，姑隐其名。评价是否确当，自有公论。孙中山先生说过：“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毛泽东是一个伟人，常人不可企及。但只要我们不再奴隶般地跪倒在地上看他，就可以知道他也有很大的局限性。他熟读《二十四史》，长于文史，精于诡道，而短于经济。敬爱毛泽东的王力，在《王力反思录》中明确说毛泽东没有读过《资本论》。为毛泽东管理图书的逢先知，在其歌颂毛泽东的文章《博览群书的革命家——毛泽东的读书生活我见我闻》中说：“至于经济管理方面的书，特别是国外有关社会化大生产管理方面的书（毛）读得更少。”论兴趣，毛酷爱文史而不喜欢马列。对于马列，他很少有津津乐道、侃侃而谈的时候，远不如他谈论文史时得心应手，神采飞扬。他迷信文化大革命，把它当作他一生的两件事之一，给世界历史上留下了一笔宝贵的遗产。给世界历史上留下了宝贵的教训。世界潮流是讲和平、自由、民主、平等、人道、发展。谁背弃了世界潮流，谁就要被它所抛弃，天公地道。毛泽东一生最大的教训是自尊自大，根本不理睬什么世界潮流。当政者对此不可不引以为戒。

经过文化大革命，毛泽东在中国留下了两大遗产：贫穷和专制。在“文革”结束时，中国的经济已濒临崩溃。中国实行了改革开放，实行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我们今天来反思：关键和症结就在如何对待资本主义。在1976年以前，中国视资本主义如魔鬼，中国共产党



患了“恐资症”，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反其道而行之，大刀阔斧地实行市场经济，中国的经济因而迅速发展，世人为之瞩目，瞠目以视，中国经济迅速发展的秘密无他，就是正确对待资本主义。

周泉纁先生在《作者自序》中说：“文革的目的和宗旨就是为了防治中国共产党腐败”。这个观点不符合事实。毛泽东从来没有这样说过，而经过文化大革命，中国共产党的腐败更严重了，沙叶新先生在其著名的《腐败文化——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中说：“当今的腐败根源是制度腐败。在这高腐的制度下，不腐败也难。”苏联共产党主席久加诺夫说，苏联覆亡的根本原因是财富垄断、权力垄断和真理垄断。前车之覆，后车之鉴。中国共产党也高度垄断，可不慎乎？

胡乔木老人生前在指导撰写《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时说过：“文化大革命没有正确之处，我们竭力寻找它正确的方面，可是找不到。”（大意如此，廖盖隆传达），可见胡乔木也是反对“试错”论的。

文革主要活动之一是“打倒走资派”，全国的领导干部遭到灾难。造成了无数悲惨的故事。当时我在“高等军事学院”工作，我们的政委是上将李志民（中共中央候补委员）。1968年秋，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召开前夕，中央因中央正式委员人数不足（许多被打倒了）而影响到会议的合法性，指示将李志民从“牛棚”中放出，让其参加会议，学院的造反派抗拒中央的指示，反而就在院内批斗李志民，李已年迈，经不起“喷气式”，不堪拳打脚踢，这位老红军，前志愿军政委，年过花甲的李志民上将跪在地上，高呼“打倒李志民”以求饶（他以为你们造反派不过要打倒我，我拥护你们打倒，不就没事了吗？！）。我作为被打垮的群众组织的一员，也坐在小礼堂内，看到李政委如此受蹂躏，心如刀绞。“打倒走资派”不符合马列主义，不符合毛泽东思想，不符合毛在文革中讲的“大多数干部是好的”，后果极其严重，错误十分显然，还用“试错”吗？文革中的“揪斗五一六分子”也是如此，几百万干部和群众因奉命参加文革而遭罪（“三指向”即将斗争的目标指向军队，指向革命委员会，指向“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就是“五一六分子”），这样，参加文革的许多人就无一不是“五一六分子”了。

我的一位老战友听我介绍了“试错”论的主要含义后给我来信说：此说掩盖了无数的血泪，怎么能有脸说出这话来？

以上所说，请周泉纁先生指正。

2007年3月7日写

~~~~~

【学术争鸣】

“文革浩劫论”不容否定 ——读周泉纁的《文化大革命是历史的试错》

• 阎长贵 •

周泉纁是清华大学文革中著名的“四一四派”领导成员之一，他思维敏捷，勇于思考问题，经常提出一些新的和惊人的观点，在文革中就被毛泽东称为“四一四的理论家”。几十年来，他不论在逆境下还是在顺境下，都痴情地执着地思索和探求关于文革的问题。最近，即在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四十周年时（2006年12月），他自费出版了一本关于文革的著作，书名叫做《文化大革命是历史的试错——对毛泽东主席公开点名评判我的回应》（简称《试错》），其中

叙述了从文革以来迄今他对文革的观点和看法。十分感谢他签名送我一本，但对他关于文革的观点实在不敢苟同。他关于文革的观点很多、很庞杂，我只对他否定“文革浩劫论”的观点作些评论。我认为——肯定地认为，“文革浩劫论”，名副其实，千真万确，不容否定，也否定不了。

周泉纁在《试错》一书中多次否定和批判“文革浩劫论”，而比较集中的是《总论》中的两段话。他说：“关于‘文革浩劫论’，一般地说，在倾向西方自由民主思想的人们中比较流行。‘文革浩劫论’认为是类似二次大战那样的社会浩劫，是毛泽东反人权、反民主、反现代化的思想和相关的社会体制必然导致的大动乱大倒退，文革不存在任何历史的合理性。”又说：“‘文革浩劫论’实际上代表了两极冷战时期国际资产阶级的利益和政治倾向；或者说代表了经济上被消灭的中国资产阶级的利益和政治倾向。”就是根据这样的理由和说法，周泉纁断言：“文革浩劫论”和“文革错误论”一样“都是错误片面的”。（第2—3页）

周泉纁的观点能站得住脚吗？完全站不住。说得不客气一点，这完全是掩盖和抹杀血泪事实的胡言乱语。

何谓“浩劫”？《辞海》和《辞源》都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浩劫”就是“大灾难”，“沉重的灾难”。难道文革不是“大灾难”、“沉重的灾难”吗？事实胜于雄辩。且看事实：

1978年12月13日，叶剑英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宣布：文革死了二千万人，整了一亿人，占全国人口的九分之一。死的二千万人，没法一一罗列。但是我们知道，上自国家主席刘少奇，开国元戎彭德怀、贺龙，党政军的高级干部，如李立三、张霖之、田家英、邓拓、阎红彦、张学思等等，著名作家老舍、赵树理、杨朔、闻捷、李广田等等，学界名流吴晗夫妇、翦伯赞夫妇、傅雷夫妇等等，等等，无一不是被迫害致死，或含冤自杀。还有北京大兴、湖南道县对“地、富、反、坏”所谓“四类分子”斩草除根的大屠杀，有80多岁的老人，还有几个月的婴儿。令人不寒而栗而又被党报、党刊称颂为“好得很！”和建立了“不朽功勋”的红卫兵制造的“红色恐怖”和“革命风暴”。如此等等，都发生在文化大革命中，都是文化大革命带来和造成的，这不是“大灾难”、“沉重的灾难”即“浩劫”，是什么？周泉纁先生是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在您批判和否定“文革浩劫论”的时候，不是把诸如此类惨无人道的事情都掩盖和抹杀了吗？就拿周先生所在的清华大学来说，在文革中被整死、被打死的老师、学生和工人也有不少，难道他们的死都“值得”？（附带说明，周先生在《试错》一书中谈到文革时多次在正面意义上使用“值得”这个词）您这样说，您所熟知的这些在天之灵能够答应？您能够忍心？

我读过一篇题目叫做《文化大革命，文化大浩劫（破四旧）——多少国宝付之一炬！》的网上文章，其中说，九州大地各种珍贵遗物遭破坏毁灭的“罄竹难书的痛心史实”，不能以拍卖行的估价估计！“当年红卫兵在大火中砸烂旧世界，老奸巨滑的康生却在劫火中精选了上千件文物据为己有，这大约也是他对中华文化的一点贡献吧！”这话说得多么沉痛，又多么幽默。最近，即今年4月，有幸到安徽亳州参观以砖雕、木雕闻名的花戏楼（系国家级重点保护文物保护单位）。该楼于400年前由山（西）陕（西）药商聚资兴建。楼上雕刻精美，其人其物，皆玲珑剔透，活灵活现，真是巧夺天工，令人叹为观止！不少参观者问及：花戏楼为什么在文革中没遭到破坏？讲解员说：当时这里驻有解放军，他们用泥巴把雕刻都糊了起来，并在上面写上“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的大标语，造反派不敢动，因而得以完好地保存下来。听到这样说，大家都唏嘘不已，一则赞扬解放军指战员的聪明和智慧，他们对付造反派的办法如此巧妙和高超；同时又有一种很不是滋味的感觉，灿烂辉煌的国家级瑰宝居然要这样保护，真是可叹也夫！可悲也夫！文化大革命，就是大革文化的命，就是文物大破坏、大浩劫。对此，周泉纁先生不会也不应该陌生。

再看经济。由于“停产闹革命”，由于武斗，工农业生产遭到极大破坏。据统计，按每百元积累的国民收入计算，在文革十年间，“三五”时期为26元，“四五”时期为16元，都少于“一五”时期的35元，而且越来越少。在工农业生产方面，每百元资金实现的利税，1966年为34.5元，到1976年下降为19.3元。其结果，在文革十年中，仅国民收入就损失5000亿元。从总体情况来说，国民经济已濒临崩溃的边缘。文化大革命对经济也是大破坏、大浩劫，这是确凿无疑的事实。

不用再说了，文革是“浩劫”，这在历史上已是铁板上钉钉，谁也抹杀不了，否定不了。

应该知道，“文革浩劫论”并不是文革后才提出来的，就是说，并不完全是“事后诸葛亮”——当然对很多人来说是“事后诸葛亮”，这没什么奇怪，因为错误往往事后才看清楚，这就是所谓总结和吸取教训，也非常需要。我这里想说的是，在文革中，还是文革早期，就有人公开提出文革是“浩劫”的论断了。这就是上海音乐家陆洪恩，他因为反对文化大革命，有“恶攻”言论，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判处死刑。在行刑前，即1968年4月20日，当局问他究竟是要死还是要活时，他愤怒回答：“我想活，但不愿这样行尸走肉般地活下去。‘不自由，毋宁死’……文革是暴虐，是浩劫，是灾难。我不愿在在暴虐、浩劫、灾难下苟且偷生。”由于他态度“顽固”，他于1968年4月27日被执行死刑，时年49岁。（参见网上文章《陆洪恩的故事》）不难看出，“文革浩劫论”实实在在是用鲜血换来的啊！

在文革后，明确提出“文革浩劫论”的权威人士是胡耀邦和邓小平。1980年6月在一次中央召开的会议上，刚刚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4个月的胡耀邦提出了要解决好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遗留的问题，必须做好的几项工作。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做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重要讲话，谈到总结经验教训时说，毛泽东虽然认识到斯大林破坏社会主义法制的错误，“但是由于没有在实际解决领导制度问题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这个教训是极其深刻的。”正是根据“文革浩劫论”的思想，邓小平和胡耀邦主持、指导起草了“彻底否定文革”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简称《历史决议》）。《历史决议》指出：“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的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造成严重的混乱、破坏和倒退”。“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证明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既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符合中国实际。”“实践证明，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它“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这场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同志发动和领导的”，“对于文化大革命这一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毛泽东同志负主要责任”。

周泉缨先生不同意“文革浩劫论”，那他对文革究竟怎样看的呢？我们仅就他文革后关于文革的观点和看法举几例。

——“没有第一次文化大革命，就没有我们这一代革命者，没有第一次文化大革命，就没有中国的现在，没有第一次文化大革命就没有共产主义的光辉未来！同志们、战友们！千万千万要注意，决不能在泼掉‘四人帮’理论这盆脏水的同时，把文化大革命这个共产主义革命的新娃娃泼出去呀！”（第425页）

——“文革是上层建筑领域内的国际共运。文革的目标是解决共产党干部和平演变问题，即解决资本主义当权派问题。关于走资派的提法很多人都不以为然，甚至到今天连共产党自己对走资派的提法也不认账，我认为这完全是自欺欺人的事。铁的历史证明，如果讲走资派的提法，在文革中是一种天才的正确提法，那么今天则是普遍正确的提法，试问当今的中共当权派有多少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毛泽东发动炮打资产阶级司令部，对于真正的马克

思主义者和真正的无产阶级而言是天经地义的。”（第473—474页）

——“毛之所以伟大，不是因为他拥有过时的无产阶级世界观和错误的文革思想与文革路线，毛的伟大主要是他的为民族复兴的拼死奋斗精神和大无畏的探索实践，为我们民族，甚至也为人类的发展，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第275页）

——“毛泽东发动的文革决不是希特勒发动的二次大战……事实上文革不但没有侵害世界上任何民族的利益，相反文革为人类提前结束世界两极局面作出重要贡献。所以，发动文革的毛泽东是民族的英雄、是世界的伟人。”（第494—495页）

——“没有文革中国就不可能迅速地改革开放，没有文革世界就不可能迅速证伪传统马克思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并迅速走出两极冷战的误区；没有文革人类就不可能迅速认识西方典型的瑞典模式社会的‘阶级等强度制衡’的和谐社会之本质，从而迅速开始构建共同发展的和谐世界；所以，中华民族为文革付出的代价是值得的和光荣的，文革为了人类的未来而勇于试错的探索精神，将在人类文明中永葆青春！”（第3页）

——“文革并不是通常人们认为的那样，是一场没有任何文化和理论内涵的动乱。”（第14页）

——“毛泽东思想，特别是毛泽东的文革思想，原则上是继承和发展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典范。”（第243页）

——“毛泽东是我唯一崇拜的共产党领袖。我认为毛是共产党内对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真正吃透的为数不多的人，也是中国历史上不可多得的有自己理论理想的人。毛说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我认为这句话高度概括了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理论实质，也高度概括了文革的理论实质。”（第440—441页）

——“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决不是为了错误的目的，用错误的方法发动的错误运动……”（第217页）

从周泉缨先生的这种种论述中，我们会得出什么结论？十分显然，在他看来，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不仅不是错误，不是浩劫，而且伟大得很，既有功于中国，又有功于世界，因此，不论中国人民，还是世界各国人民，即全人类，都要感谢毛泽东。换句话说，根据“文革浩劫论”的思想做出的《历史决议》是彻底否定文革，而周泉缨先生的观点则是彻底否定《历史决议》。一句话，他认为，毛泽东关于文革的基本理论（如“走资派”、“造反有理”等）和基本实践都是完全正确的，文革是“共产主义革命的新娃娃”！从文革结束到现在，《试错》仿佛是我读到的把文革捧得最高的一本书，在这本长达40万字的大书中，除了轻描淡写地谈到红卫兵推倒和砸烂清华大学的标志性建筑二校门，文革初期清华有七、八百名教师、干部和学生被打成“右派”和“反革命”，以及1968年7月打死打伤700多工宣队员，其他文革中大量的无数的对物的破坏、对人的迫害，几乎很少谈到。《试错》一书给人的感觉：“文革好得很”，诚如文革中歌曲所唱的“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然而，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能够认同和接受周先生自诩的这种对文革“当代最科学最正确的评判”吗？！我认为，如果不是周先生头脑发疯发狂的话，那只能是他闭门造车的臆想。

不能否认，周泉缨先生否定和批判“文革浩劫论”，确实有个历史背景，这就是近年来“文革思潮”回潮的情况（姑且不谈由于什么原因）。比如，有人说文革是“更深入的社会主义革命实践”，有人说文革是毛主席留给人民的粉碎国内外资产阶级和平演变的“法宝”，有人说为了

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要不断地进行文化大革命，有人说文革对工农兵来说不是灾难，而是“解放区明朗的天”，“快乐的节日”，甚至有人高呼：“我们敬爱的领袖毛主席亲自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胜利万岁！”如此等等。就直接否定“文革浩劫论”的观点来说，也不是周泉纁先生的“专利”。2002年9月《当代中国史研究》发表了一篇《论更加公正客观地看待党在“文化大革命”十年中的失误》的文章，编者在“摘要”中概括作者对文革的主要观点说：“‘文化大革命’十年是党史、国史的有机组成部分，‘十年浩劫’这一寓意抹杀一切的不准确表述，不宜作为这一历史时期的代名词。”在周泉纁的《试错》出版后，还有人2007年3月25日在毛泽东旗帜网上发表的《毛泽东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不容否定》的文章中说：“有些人显然夸大了文化大革命的负面影响，他们把文化大革命说成是一场浩劫，说什么文化大革命使我国的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这样说是完全不符合事实的。”当然，周泉纁先生所说的“文革浩劫论”还是有他的特点和“创造性”的。我们分析一下。

周泉纁说：“‘文革浩劫论’，一般地讲，在倾向西方自由民主思想的人们中比较流行。”这话是什么意思？说白了，这不就是说“文革浩劫论”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观点吗？如此说来，坚决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邓小平他主张“文革浩劫论”不也成了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了吗？再说，自由民主思想仅仅是“西方”的吗？不，它是普世价值。温家宝总理最近在一篇重要文章中说：“科学、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并非资本主义所独有，而是人类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共同追求的价值观和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

周泉纁说：“‘文革浩劫论’认为文革是类似二次大战那样的浩劫，是毛泽东反人权、反民主、反现代化的思想和相关的社会体制必然导致的大动乱大倒退，文革不存在任何历史的合理性。”这段话问题也很大。有哪个主张“文革浩劫论”的人，把文革和二次大战相比，二次大战是世界大战，文革是内战，按毛泽东的说法是“全面内战”，二者怎么相比？说毛泽东有“反人权、反民主、反现代化的思想”，这从我们上面所说的文革浩劫的事实中应该说是看得很清楚的。就拿国家主席刘少奇说吧，他被迫害致死，符合人权、符合宪法吗？其他在文革中无数含冤自杀的、被整死的，以及遭受折磨但未死的，无不如此。有首《咏“臭老九”》的佚名诗，其中云：“九儒十丐古已有，而今又名臭老九。古之老九犹叫人，今之老九不如狗。专政全凭知识无，反动皆因文化有。假如马列生今世，也要揪出满街走。”这首描述和反映文革中知识分子状况的诗，既生动，又符合实际。人权安在？民主安在？文革影响和耽误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这也是明白无误的事实。关于“相关的社会体制”，我们在上面引述邓小平“文革浩劫论”的观点时也说了。那里指出，毛泽东虽然认识到斯大林破坏社会主义法制的错误，“但是又有没有在实际解决领导制度问题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至于文革造成中国的“大动乱大倒退，文革不存在任何历史的合理性”，这在《历史决议》中已经说得清清楚楚，人们尽可不同意，但需要拿出事实来，周先生举出一件令人信服的事实来了吗？我看没有。

周泉纁说：“‘文革浩劫论’实际上代表了两极冷战时期国际资产阶级的利益和政治倾向；或者说代表了经济上被消灭的中国资产阶级的利益和政治倾向。”周先生在对“文革浩劫论”做阶级分析。这就怪了，周先生不是“证伪”了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吗？您怎么又像马、恩、列、斯、毛一样用阶级分析法做起阶级分析来了呢？至于说“文革浩劫论”代表“国际资产阶级的利益和政治倾向”或“被消灭的中国资产阶级的利益和政治倾向”，这纯粹是信口雌黄，连三尺小儿都不会相信。如果按照周先生的说法，那邓小平以及许多主张“文革浩劫论”观点的人不都成了代表“国际资产阶级的利益和政治倾向”或“被消灭的中国资产阶级的利益和政治倾向”的人了吗？

总之，不论从什么意义上，或者是文革中的无数灾难事实，或者是周先生的思想理论逻辑——混乱逻辑，都表明他否定和批判“文革浩劫论”的观点是错误的，站不住脚的。

最后说一点。我想，大概现在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注意到“文革思潮”回潮的情况，他们又郑重重申“文革浩劫论”。温家宝总理在2007年2月26日新华社发通稿的重要文章《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任务和我国对外政策的几个问题》中，说：“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我们的某些重大失误，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又使我们丧失了一次大的发展机遇。”在讨论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时，温家宝总理的话很值得我们重视。我就用温总理的话作为我这篇文章的结束语。往者可鉴，来者可追。牢记沉痛的和血的教训，在当今迅速发展、激烈竞争的世界上，我们决不能让文化大革命的浩劫重演，使我们再一次丧失大好的发展机遇了。

本期编辑：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CND》总编：
华新民（美国）	思语（美国）	陈天寒（美国）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专用地址：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中文文件：hwxz-info@cnd.org 英文文件：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http://www.cnd.org/>
